

A

ANNUAL REPORT ON

CHINESE LITERATURE 2003

2003年

中国文情报告



主编/白 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年中国文情报告

Annual Report on
Chinese Literature 2003

白 烨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年中国文情报告

主 编 / 白 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责任编辑 / 顾 舟

责任校对 / 边 钟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17.5

字 数 / 223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214-9/I·003

定 价 / 35.00 元 (含光盘)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年中国文情报告/白烨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

ISBN 7-80190-214-9

I .2... II .白... III .文学-概况-中国-2003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9884 号

《中国文情报告》课题组

主编 白 烨

编委 贺绍俊 阎晶明 陈福民

李兆忠 周 瓚 王剑冰

吴 双 陶庆梅

秘书 何 鹏 李 旻

前 言

白 烨

一 这个课题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自身发展的诸多因素推导之下，文学发生了愈来愈明显，也愈来愈缭乱的变化。有人把这种变化形容为“群莺乱飞”，有人把这种变化比喻为“乱花迷眼”；有人把这种变化概括为“无可命名”，有人把这种变化称之为“多元并举”。这其实只是概而言之，具体来看，文学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促成这些变化的有哪些动因？社会生活给文学带来了什么？而文学又给我们提出了什么？这些与现实与时代密切相关的文学现状，越来越难以把握，也越来越需要把握。

我们这个“文学年度文情报告”，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根据面对现实、研究现状这样的切实需要而设计的课题。组织这样一个课题，意在通过对文学现状进行分门别类的追踪与考察，清点年度文学成果，绘描年度文学风貌，记录年度文学足迹，梳理年度文学脉络，特别是通过对一些倾向性文学现象的捕捉，更为内在地把握年度文学的宏观走向与主要问题。这样的即时又连续的文学考察，近可成为年度文学的一份忠实报告，远可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份历史记录，无疑是有其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的。

客观地说，文学的发展与演进不一定与年头的更替和递进有太多、太大的关系。但一年作为一个时间段，毕竟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的角度；另外，如从年初就有备而来，分工把口，这样持续追踪到岁末，基本把握一年的文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我们这个课题组，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部分研究人员和中国作家协会部分专业人士组成，基本都是目前活跃在文学批评前沿阵地的中青年专家学者。我们在整体的“实证”与“客观”的总要求下，主张适当显现研究者个人“眼光”与“观感”，因此，这份“文情报告”，带有我们课题组成员的“角度”与“个性”，是经由我们的“主观”感受所浸润的“客观”报告，这是特别要加以说明的。

二 创作鸟瞰

2

2003年在上半年发生的“非典”，作为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给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威胁，也使文学创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及其由它所激发出来的生命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张扬，也会作为一次难得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对文学家们日后的文学活动产生应有的深远影响。

总体来看，在文学创作方面，2003年仍然是平稳前进并持续丰收的一年。但各个门类的创作，在辄见佳作力构的同时，也显现出了一些新的倾向与新的问题。

在小说创作方面，中短篇小说中有相当一些作品，把镜头投向社会底层的人们，写他们在变革时期的个人生活的艰窘，写他们在艰窘现实中对于理想的寻找，对于精神的坚守。如《寻找妻子古菜花》（北北）、《我们的骨》（陈希我）、《包工头要像鸟一样飞翔》（孙春平）等。这样的作品仍带有很强的写实性，但却因精神内涵的高峻与独到，读来让人既感亲切，又感亢奋。写实性

的作品，在过去往往成为庸琐生活的翻版的现象，在 2003 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这应该是个可喜的迹象。长篇小说方面，当人们只为《白豆》（董立勃）、《扎根》（韩东）等作品眼睛一亮，心里不免为沉寂的上半年暗暗着急的时候，下半年接踵出现了《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叶兆言）、《百草山》（李西岳）、《士兵》（兰晓龙）等力作；而到年底，血肉饱满的《受活》（阎连科）、《水乳大地》（范稳）又相继而至，让人们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惊喜。《受活》和《水乳大地》已在评论界得到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立足于本土经验的文学想像的力作。这两部作品的更多更深的意义还有待于挖掘，但那意蕴上的浑厚、形式上的独到，已经使得它们无法受到轻视。有趣的是，长篇小说在 2003 年的“市场化”运作方面，同样惹人眼目。先是有毕淑敏的《拯救乳房》，因书名的过于“市场”而引起争议，但在争议声中作品的印数不断上升；后来又有刘震云的与同名电影同步上市的《手机》，先是观众与读者在两相比较中说长道短，后又引来据说遭到了影射的某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反唇相讥；《手机》也是在这种一波又一波的争议声浪中，印了又印。长篇小说的“市场化”运作，已成为一个基本的趋势，而这种“市场化”运作，又常常以“媒体化”“炒作”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在 2003 年又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但毋庸讳言，这样的“运作”与“炒作”，对于作者、出版者和读者来说，都是既有其利又有其弊的。比如，图书包装上的“粗粮”“细作”，图书“炒作”上的“雅”作“俗”说，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作者的迷惑性，然而也让读者对这些作者和出版社产生了某些疑惑。

2003 年的散文，依然是生活的五行八作的心灵感应和文学写照，而在“怎么写”上，写实性的，思辨性的，随想性的，意绪性的，都应有尽有。但总体来看，以历史人物和人文事件为素材的“大散文”写作，作为一种倾向似乎更为突出一些。这不仅表现在职业作家中有较多的人投身于此，而还表现为业余作者中

有不少的人也热衷此道。前者如《在河之南》（郑彦英）、《用破一生心》（王充闾）等，后者如《与历史同行》（冯伟林）、《凡圣之间》（易洪斌）等。这些作品既以深入的发掘、独特的体悟，触摸了中华文明的浑厚人文经脉，也以宏阔的视野，灵动的思维，拓展了散文的表现空间，使“大散文”在散文领域愈成气候和愈见光彩。

纪实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有着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传统。2003年由“非典”、洪水构成的突发事件，恰恰给报告文学提供了丰盈的素材。因此，我们从《国难》（徐刚）、《护士长日记》（张积慧）等作品里，既看到了“国难”面前的脉脉人情，又看到了作者蕴涵在字里行间的深深忧患。如果说2003年的报告文学还让人读到了几分沉重的话，那一定和《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有关。这是一部以作者之良知唤起更多人之良知的心血之作，它让人们看到了农民的种种苦难，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坚韧又缓慢的渐变。在传记文学这一小门类里，2003年中有不少作品相当惹眼，有的还位居畅销书排行的前列。从毛泽东、宋庆龄等伟人，到巴金、金庸等文人，都有不少传记类作品出版。但影响较大又雅俗共赏的，可能还是杨绛的《我们仨》。这部作品由“梦想”与“现实”两个部分组成，写出了钱锺书一家相濡以沫的人生岁月，也显出了作者以枯淡写绵长的不凡功力。

“非典”的出现，使得很多人更为看重非直接性的网上交流，因而使得文学网站一时大受欢迎，但网络文学在2003年，在涌现新人和出现新作两个方面，都没有太多的现象可圈可点。颇受关注的王小山的《我亲爱的死鬼》和苏昱的《上海夏天》，前者是作者对既有经典的个人解构，后者是作者对《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一次仿写。可称为亮点的，可能还是年底由门户网站“新浪网”主办、“榕树下”等协办的“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

赛”。这次大赛从11~12月的两个月间，便收到参赛作品1.8万多件，参赛作者之众，收到作品之多，都前所少见。据知，在小说这一门类里，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为数相当不少，其中分获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奖的作者阿闻、铸剑和安昌河，均为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但据由作家和评论家构成的评委讲，他们的这些获奖作品的艺术水准，与一些知名作家发在文学刊物上的头条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网络文学总体上看，还处于变动不居的成长时期。这种有读者又有专家参与的大赛，对于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三 批评概观

2003年文学的理论批评，整体来看，话题很丰富，视野也很开阔，在“文学叙事的变异”、“文学的想像”及小说现状、诗歌现状、网络文学的本质与特点等方面，都有相对集中的研讨和比较深入的思考。但相比较之下，文学文化批评中有关“大众文化”现象的论争和有关“文化批评的得失”的探讨，可能更属于该年度颇见新意的理论批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切中着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

5

有关“大众文化”的话题，近年来时有所见。但围绕此话题展开比较集中的研讨的，是由刊于1月23日《文艺报》上的王先霈、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的文章引发的。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大众文艺是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闲、娱乐等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艺在90年代以后萌生并发展起来，它与主旋律文艺、高雅文艺一起，形成了现时期文艺领域内的三足鼎立。综观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学的有关讨论，对作品思想内涵及审美境界偏高的期望和要求，常常使许多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出版者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审美高度与市场生命强度三者难

以兼长的情况下，莫可适从，无法自处。我们应该对大众文艺的思想深度的要求适度淡化，给大众文艺减轻负载，让它增强活力，与国外的娱乐产品竞争，将劣质的有害的产品排挤出文化市场。此文发表后，《文艺报》专设了《“大众文化”论坛》专栏，相继发表专题文章讨论“大众文化”问题。从讨论的情形看，赞成的意见不多，而批评的意见不少。不同的意见主要表现在对“大众文化”概念的理解不一和进而引申出来的不同看法上，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大众文化”这个词本身很可疑，又人言言殊。有的人在“以消费为目的，以利润为价值定位，以表达感官欲望和身体快感为特征”的涵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有的人则在“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的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这背后其实隐含了一个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问题，即“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必然对大众文化给予否定性的批评，而“站在民间大众的价值立场，以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平民化的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来看大众文化，则更多看到其积极的意义（赖大仁）。不能企求这个讨论马上有什么结果，不同角度的看法和不同立场的意见，藉此得以沟通和交换，都以现代理性精神来看待和评说大众文化，本身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进入 90 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因种种原因面临诸多困境，表现出分散、滞后与失语等不景气现象，已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在新时期曾有的影响与地位。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一基本状况一直未有根本改变。因而，如何看待文学批评的现状，如何拓展文学批评的路子，重振文学批评的雄风，始终是文学批评界一个经常言说与反复研讨的话题。在 2003 年，结合新的文学现实，一些批评家开始思考有关文学批评如何引入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刚一展开，不同的意见就初显端倪。王晓明、蔡翔、戴锦华等人从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等视角认为，近十年的文学批评正在逐渐丧失它的思想活力，而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说借助文化研究

的眼光，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是有可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某种活力的。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文化研究，是在面向当代文化现实的新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不是鼓吹一些西方的空洞理论，而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深刻敏感。他们实际上是重新回到生活，和社会现实积极发生联系，坚持一种批判精神和立场，并对以往的知识谱系进行重新反思和清理。而陈思和、杨扬和曹文轩等人则对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批评，明显地表现出某种犹豫与保留。他们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不是文学批评。国内现在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现实生活变化非常快，在文学批评还没能对变化了的现实做出有效的思想反映的情况下，文化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地切入现实，对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还不是一回事。文学创作不可能一下子与社会生活贴得那么近，尤其是审美方式，其变化是缓慢的。文学有自身的功能和变化节奏，要养成一个时代的审美风气意识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要改变一个时代的审美习惯很不容易。所以，不能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批评。而已有的文化批评，已经在误导读者离开文学和文学学风的浮泛化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7

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好像一些意见互有不同，好像一些意见又互有交叉。总体来看，文化批评的批评实践以务虚性的和口号性的居多，结结实实又卓见成效的文化批评还比较少见。但它作为与文化现实相对应的一种批评，无疑是有其用武之地的。而学界有关文化批评的不同意见，也有助于它在发展中扬长避短。事实上，就在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进行的同时，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也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发展着。如对文化场域“大众化”的观察，对文艺的“消费性”现象的检省，对批评的“媒体化”现象的思考等等。事实上，文化批评已作为一种与文学批评互补互竞的方式，成为整体批评的重要构成。

四 事件述要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坛上发生的各种事件逐渐多了起来。这里，既有人们在文学观念上的不断分化而致使纷争增多的原因，又有市场化等因素介入文学之后逐步引起利益冲突的原因，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因素或背景，那就是文学文化环境的日渐宽松和各类媒体的找寻新闻由头，使得一些原属文学内部的“门户”之见和“圈子”争论，经常以文学和文化的“热点”被显现和放大。这便使人们要了解当下的文坛，仅就作品看作品已远远不够了，还必须关注一些影响甚大的事件。

2003年的文学事件，除上半年因“非典”略显沉寂外，构成“焦点”与“热点”的事件，大小不一一直不断。但从问题的相对重要和影响的相对广泛的角度来看，一些作家退出作协、小说《沙家浜》的争议和“木子美现象”，可能更为突出和显眼。

8

大约从2003年7月开始，先后有湖南作家余开伟、黄鹤逸，上海青年作家夏商，江苏作家陈锡民，相继提出申请和发表声明，要求退出所属的地方作家协会。10月份，山西著名作家李锐、张石山加入到退会的行列，使“作家退作协”更为文坛内外广泛关注的事情，以至于许多媒体都用“作家炒作协”的形象化语言来描述这一现象。李锐和张石山均为年富力强又影响甚大的实力派作家，他们以发声明和写信件等方式，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只保留省作协会员身份。这些退会作家在谈到退会的理由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目前作协体制的严重不满与深刻失望。归结起来，大致是：作协体制日益衙门化、官僚化；在这种体制下，一些有心做官、无心“文学”的人相互争权，而那些真正热爱创作的作家却成了“裱糊”门面的。他们的做法与说法，在许多作家那里引起了回响与呼应。一些知名作家纷纷发表谈话，除对他们表示理解和敬意外，

也对现行的作协体制发表了自己相似或近似的看法。事实上，作协这种在建国前就建立起来的组织体制，已运作了半个多世纪，也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主要的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作协已成为半官方的行政机构，中国作协是部级单位，地方作协是局级单位；这样就使在作协任职有了某种实惠，这或者使一些有权欲的人争权夺利，或者安排一些党政干部进来又造成外行领导内行。作家退作协，在一些作家表达个人意愿的背后，实际上是他们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人们郑重提出作协体制的严重滞后问题，这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警觉与重视。

小说《沙家浜》的争议，是由浙江青年作家薛荣对于“样板戏”《沙家浜》的改写引起来的。小说《沙家浜》沿用了“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但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以及故事的内容，则与原作完全不同甚至面目全非：靠一家茶馆维持生计的阿庆嫂，既是“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公开的姘妇，又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秘密情人；而因为中间有个“风流成性”的阿庆嫂，胡传魁与郭建光只好相互掣肘又相互联手，作品因此在火药味中又充满情欲味。这个作品一发表出来，既遭到《沙家浜》故事发生地沙家浜镇政府的强烈抗议，一些文坛人士也纷纷著文予以批评。其中最为严厉的批评，是来自郝铁川的题为《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的文章，他认为小说《沙家浜》对阿庆嫂和郭建光这两个人物的肆意改写，践踏了这两个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是“勇敢和正义的化身”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的形象，因而，既“不合理”，又“不合法”。这一批评又引来董健、丁帆、王彬彬等人的反批评，董健等三作者表示，他们无论是对样板戏《沙家浜》，还是对小说《沙家浜》，都“不欣赏”，但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文学问题”，“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纲上线’的做法，都是荒谬的”。他们特别不能同意郝铁川把阿庆嫂和郭建光看成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的说法，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江青们的‘斗争哲学’

的“文革精神”的“样板戏”的肯定。这次讨论的主题，就这样从如何改写原作，很快转换到了如何看待“样板戏”。客观评价这场争论，应该说得到批评的小说《沙家浜》确实品位不高，这种品位不高的改写也没有多大的文学意义；但郝铁川的批评确有过于从政治的眼光去看问题的倾向，而董健等人的反批评也有把复杂的“样板戏现象”简单化的嫌疑，因为一些人喜欢“样板戏”，可能只是出于京剧艺术本身，并非有什么政治因素的考虑。这些年有关“样板戏”时有争论，而这背后又涉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作品等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理与解决，因而成为一个不断在现实中被提及的历史问题。

“木子美现象”，是指署名“木子美”的日记体作品《遗情书》在网络连载后，作者一夜成名的现象。原为广州某小资读者的女编辑木子美，从6月19日开始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8月某日，木子美在《遗情书》中记录了她与广州某著名摇滚乐手的“一夜情”经过细节，其日记开始在传媒界、音乐界及网络间广为传布，木子美由此“一炮而红”，并引来广泛争议。约在11月间，木子美的《遗情书》在地下书市出现，并有多版本。“木子美现象”的堂皇出现、引起的反响以及背后显示的问题，都很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诚如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学者所言：“就木子美现象谴责一个人是没有用的，要看到它背后出了什么问题。”这背后的问题，概要来看，就包括了社会文化状态的浮躁，各种文化行为都有滋生的土壤和表现的机会；而一些个人在张扬个性时，因素质不高或爱走极端，把低俗当高雅，把乖戾当时尚；而在这个媒体的时代，网络越来越追求点击率，报纸越来越关注可看性，使得判断作品与问题的基本道德尺度淡化或弱化。可以说，当基本的规范都没有时，宽容的尺度也就没有了。“木子美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和负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被传播和放大，正是失却规范的网络与媒体最终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木子美现象”所反映的木子美个人的

道德叛逆，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网络和中国媒体的职业操守的挑战与考验。而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我们的网络与媒体交出的是并不合格的答卷，而这正是值得我们认真检省与深入反思的。

如果要简洁地总括 2003 年的文坛，也许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表述：

文学创作在“艺术”与“市场”的两极游走；文学批评在“文学”与“文化”的两端徘徊；文学论争在“学理”与“媒体”间双向碰撞。

对这些事象和它们背后的因由略作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看法：第一，“市场化”已越来越深入地向文学内部渗透，这一过程先由改革文学文化环境开始，再到影响具体的生产过程。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门类如长篇小说，已逐步进入到“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其他文学门类，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如何在适应“市场”中存在和发展的课题。第二，由于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双向作用，2003 年的文坛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在对社会生活和当下时代的进而切近中求新务实的基本取向，因而作品普遍有了更

11

足的底气和更多的生气。这在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的写作之中，都有十分明显的表现。

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在撰稿、看稿和统稿的过程之中，经由这些分门别类的“报告”，我又对 2003 年文坛的种种事象进行了一番梳理与巡礼。我感到，这份“报告”，用以“点”带“面”和“点”、“面”结合的方式，如实又全面地反映了年度文坛的大致情形与基本风貌，称得上是一份年度文坛的“总账”，对于文坛内人士回顾和总结文坛，对于文坛外认识了解和触摸文坛，都会有一定的裨益。稍嫌不足的，是有关文学生产体制与机制的演进情形，虽在一些部分有所涉猎，但未有专题加以观照和研究，因而反映的有欠具体和深入，这也给我们在今后更好地完善这份报告，留有了继续努力的余地。

做这样的“文情报告”，在我们的文坛是第一次，在我们个人也是第一次。我们愿意在尝试中不断进步，也真诚地希望读者和方家不吝赐教。

2003年3月15日于北京朝内